

中國政治

(第一分冊)



北京書店東總分店印行

中國政治思想史

(增訂版)

——第一分冊——

呂振羽著

北京書店總發行

一九四九年六月

中國政治思想史

(第一分冊)

著者 呂振羽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經售者 各分支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工廠

元 價定本基

安.2000. 版翻月六年八十三國民

增訂版序

本書的初版稿，是一九三六年在南京匆忙中整理完成的，一九三七年由上海黎明書局出版，發行了五千冊；一九三九年在重慶，曾改訂了一次，由桂林文化供應社接受出版，到現在還沒見發行。

現又就初版在文字上略加增減，並改正了我自己所發現的一些錯誤看法。但自己仍感覺太草率。我膽敢把它付印，意在貢獻給讀者作為研究中國哲學史乃至中國社會思想史的一種參考資料；同時，拋磚引玉，我也可藉以獲取讀者的指教，以便重行刪訂。

一九四三、三、二一，呂振羽日序。

初版序

(一)

本書原係我所編『中國政治思想史講義』稿修改擴充而成的。在系統上和原來的講稿比較，雖沒有過多的改變；然已不僅有詳略的不同，而對於歷史上各派思想家所代表的階級立場，都有重新估定的，自不免有結構上的部分變更。

我原先並沒有打算把這部講稿整理出版，後由於許多朋友和同學的鼓勵，才提起我這種勇氣。本來，在沒有產生一部較系統而正確的中國社會通史前，無論中國政治史、軍事史、法制史、哲學史、文學史、藝術史、宗教史……各部門的研究，要那些對中國社會史（至少經濟史）沒有素養的學者去擔任，實無異『大海撈針』，難以摸索着條緒的。何況在時代悠久，文獻『渺如浩海』而又真偽並出的情況下，更將增加研究的困難，也是無可諱言的。我是研究過中國社會史的人，無論我的見解正確與否，總算曾找出了一個粗略系統。因之，在拙著『中國社會史』沒有完成前，提早整理『中國政治思想史』出版，供從事中國史各別部門研究者的參考，在繼承民族文化遺產的課程下，給中國社會思想史的發展以初步的估計，以及從歷史上來給予時代以較系統的暗示，又是我的一種不可逃避的義務。

務。

本書包括的時代，係從階級社會的殷代奴隸所有者時代開始，穿貫着封建制的全時期——初期封建制、專制主義的封建制時期，以至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過渡時期。我企圖對這長時期中社會思想的各流派，從其形成、發展、死亡的過程上，以及其相互對立鬥爭——作爲各別階級的本質的對立和同一階級內部各階層的統一對立——的關係上，作系統的探究。不過關於近百年這一部分，我尊重出版者的意見，不包括在此次出版的這部分之內，擬另於短期內出版。這是我自己引爲歉恨的，諒聰明的讀者必肯原諒。（補註：按近百年部分的稿子，已於平津淪陷時被焚。）

我的編著體裁，根據我對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初步結論，首先把中國史全過程劃分爲各個階段，各個階段又劃分爲其發展過程的各時期；從各個社會階段和時期的階級階層的構成上以及其相互關係的變化上去論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又把每個流派中各思想家的思想，作爲其自己的一個體系去論究。所以我的原意，是在學習『剩餘價值學說史』的精神去編著的，結果自不免『東施效顰』。

（補註：本書原和我所編『中國經濟史講義』的精神去編著的，所以對歷史各階段、時期的社會經濟及階級構成階級關係和其變化，在這裡沒有詳論。在沒有覓得『中國經濟史講義』整理出版前，暫請讀者去參考拙著『中國社會史綱』（已出版一二兩冊）。）

關於中國社會思想史這一專門的研究，前此已有些斷代或全部的著作，但由於馬克思主義者對這方面研究的歷史還很短；有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作品，由於其方法論的錯誤，沒能作出正確結論；資產階級學者的著作，由於其立場和方法論的關係，都未能得出較正確的結論，像梁啟超，胡適等人

的作品，在當時會有相當的進步意義，到今日却已成了落後的東西；那些由假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的托派漢奸作品，不獨由於其方法論的錯誤，而且由於其別有用途的卑鄙陰謀，其作品便完全是反科學的有害的東西，不當作為學術研究來看的東西。所以到現在還沒有一部能比較令人滿意而符合時代需要的產品。然對於中國社會文化思想作一較正確的總估計，在民族現實的實踐鬥爭上，在民族文化傳統之批判的繼承的要求上，又是一件不容緩的事情。這部拙著還不是以中國民族文化思想的全面考察為範圍，而只是其中的一個部門，其是否能獲得較多的同情，比較能符合時代的要求，那只好期待於事實的反響。

(二)

(增補)：

百年來，特別是近二十餘年來，國人對民族文化思想的估計，大致有五種不同的立場和流派：

第一，從維護封建勢力立場出發的保守派。他們無條件擁護舊文化思想，並以之作爲反對進步、反對新文化的武器。從辜鴻銘、林紓以來的某些人，就是這派思想的代表，依照他們，非把民族文化溺死在封建思想的深淵中不可。抗戰以後，其中某些分子，却從民族氣節、民族反侵略思想的優良傳統上，表現着相當的進步性，表現其要求民主的思想。

第二，代表官僚資本的一派。太平天國後的洋務派，主要是進步官僚和少數官僚資本者形成的，還不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流派。他們一面無條件擁護舊文化思想，一面也提倡科學，即所謂「中學爲體

，西學爲用」；前面是保守的，後面是進步的。如果在當時，進步的一面能克服落後的一面，近百年來的國情便可能不同。從洋務派蛻化出來的保國會派，便成了官僚資產階級的流派。他們一面提倡科學，民主，反對封建思想；但沒有解脫舊文化思想的羈絆，特別像康有爲，完全用儒學的教條去解釋其維新思想，表現其維新思想的無力，也表現其對儒學的曲解。另一方面又主張用由上而下的改良主義辦法，去打開資本主義的前途，建立君主立憲的國家。所以他們的思想，在當時說，基本上是進步的，而改良主義的政治行動却是保守的。戊戌以後的立憲保皇黨，客觀上成了滿清政府拿來欺騙人民、反對革命的擋箭牌。他們對於舊文化思想，基本上是妥協的，但『立憲』的口號，却還有點民主思想的內容。『五四』時期的梁啟超等人，一面贊成新文化，並接受實驗主義的方法來整理國故；一面又對舊文化思想妥協，且把科學拘禁在狹隘的圈子裡。前面在當時是進步的，後面是保守的。大革命失敗後的所謂『再生』派，成了地方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流派，他們宣佈社會科學和『東方文化』齊驅並駕。而此所謂社會科學，又是已喪失科學內容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對民族舊文化也不是批判地繼承，而是無條件的擁護其一半。抗戰以後，他們一面要求民主和團結，一面也贊助文化思想統制政策。今日他們和中國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者最重要的不同點，就是他們還有一種要求民主的思想。

第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派。他們在『五四』運動時期，和馬克思主義思想者對舊文化思想共同作過激烈鬥爭，提倡思想解放和自由，宣傳科學和民主。這種自由主義的思想文化運動，在當時，也有着相當大的進步意義。他們雖是無條件的反對舊文化思想，沒有估計到它好的方面，即其優良的傳

統，或具有現實意義的積極的進步的因素，而在舊勢力籠罩下的當時中國，也是有必要意義的。但在「五四」以後，他們便捲起戰旗，漸次與保守勢力妥協，因之，對舊文化思想，便應用其不澈底的科學方法，給以不恰當的、過高或過低的估計，和牽強附會的解釋。這不僅符合一般保守勢力的要求，並成了其一部上層分子服務於文化專制主義的橋樑。今日其一部上層分子執行了文化專制主義者的思想統制政策，對其原來所執持的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想，便打了折扣。但他們和文化專制主義者仍有重要的不同點，即他們還有點民主和自由主義的思想，和一點實驗主義的科學態度。他們應用實驗主義對民族文化思想的研究，會有着相當的成績，但却始終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從而也不主張繼承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他們是典型的洋八股派。

第四、資產階級流派。他們在「五四」以前，沒有像自由主義派一樣，對舊文化思想作過鬥爭，也沒有對舊文化思想系統地考察過；但由「五四」後到大革命失敗期間，他們却比自由主義派進步，和馬克思主義者一道進行過反封建文化思想的鬥爭，其代表者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也是一種偉大的民主思想。不過其代表者的哲學思想體系中，也還存在着和舊文化思想妥協的空隙。在大革命失敗後，和大地主妥協的大資產階級，便改變了從來的立場，一面雖沒有把革命的口號完全丟棄，基本上却放棄了那種偉大的民主思想，並和舊文化思想妥協，提倡舊思想舊道德，強制青年讀經。這不是別的，是利用舊文化思想和「舶來」的法西斯思想合流，構成其反動的中式法西斯主義的思想體系和文化思想統制政策。所以這期間，他們對舊文化思想，便只強調其保守的、落後的、反動的一面，而拒絕其積極的、進步的、有生命的一面。這時期，他們喊着「發揚民族固有文化」的口號。這口號的本身

並非完全不對，問題是在於從什麼立場上去「發揚民族固有文化」、和「發揚民族固有文化」的何種東西。而他們的立場却是保守的，所繼承的民族文化，不只是無批判的，而又只是其糟粕，只是那些穢污的、過時的、死去的、或行將死去的東西；對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即那些有現實意義的、有生命力的、積極的進步的東西，却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在抗戰第一階段，他們爲着想利用人民，對民族文化思想的動態，表面上有某些改變，表現着進步的傾向；在思想戰線上的反日這一點上，還有一點半點的進步意義。但自國軍退出武漢，抗戰進入第二階段後，他們不僅一天比一天倒退，而且比十年內戰時期更保守、更反動，更法西斯化了。然而我們仍希望國民黨的非法西斯分子，起來和人民一道去反對其法西斯主義，在抗戰建國的民族文化戰線上繼續前進，和全國抗日的、尤其是前進的黨派及人民，在創造民族新文化的任務上，共同去繼承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

第五、代表人民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中國舊文化思想，自始就表現一種嚴肅的態度、正確的立場，自始就在應用史的唯物論的徹底科學方法去加以估計。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不只反對過時的、死去的、或行將死去的舊文化思想，而且要求批判地去繼承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即那些有現實意義的、有生命力的、積極的進步的東西，而加以發揚。『五四』運動時，李大釗的『今』和『青春』等論文，就開始表現了用史的唯物論的觀點去認識民族文化思想的傾向。

中共成立後，在中共機關雜誌中所發表的一些歷史論文，基本上，便開始表現了對民族文化正確處理的方向。在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極困難恐怖的環境下，也努力進行了對民族文化思想的探討工作，雖只是個別的少數人在進行，成績也並不太大，然却理出一個初步系統，也可見

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民族文化的何等重視！抗戰以後，中共領袖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等天才著作，不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模範，是馬列主義在中國革命具體環境具體鬥爭中的發展，可以應用於東方一切被壓迫民族革命的指導原理；而且是民族文化優良傳統的結晶，是民族文化優良傳統之繼承的表率。在文化革命方面，他不僅正確地估計了民族文化，提出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優良傳統，創造民族新文化的方針和任務，而且把它貫徹到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實際行動中，至今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已成為支配文化生活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形態的現實東西。由此可見，只有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才真正重視民族文化，才能科學地認識民族文化，繼承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因此，深入地展開對民族文化思想之史的研究，把研究的結果提供到實踐上，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是必要的課題。

上述五派，由於立場觀點，方法和主張的不同，便發生對民族文化思想不同的認識和估計，而得出不同的結論。但真理却只有一個。

(三)

中國民族哲學思想的傳統，是相當豐富的。世人常是這樣說：「日本民族沒有其自己的哲學，中國人却是富有哲學思想的民族。」這當然是不正確的。然中國民族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由於封建制所經過的時期分外久長，而產生了較高的封建主義文化，所以在封建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形勢一再得到緩和的基礎上，作為封建統治階級哲學的儒學和道學，都獲得一再反覆的發展與闡揚，佛學雖產生於印度，然而在中國始獲得其系統較高的發展。可是無論何種哲學思想，雖然有由於其民族所

處地理環境等關係所給予的特殊性，以及由於歷史傳襲等關係所給予的特殊性等基礎上，會給予其民族的意識形態如哲學等以特殊的色彩；但在其根源上，作為精神產品的哲學等東西，其本質却不是民族的，而是階級的。

過去儒家對歷史上各種社會思想流派的分野，一貫的分別為所謂儒家、道家、佛家、法家、名家、陰陽家、雜家……等所謂九流百家；這完全把社會思想存在之根據的階級內容隱蔽了，結果自然不能說明其本質。從『五四』運動開始，資產階級各流派的學者，應用不澈底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最初從事這種研究的，在中國為胡適、梁啟超、李石岑諸先生，在日本有渡邊秀方等。但他們對社會思想流派的區分，完全承襲着儒家。從他們的成就來看，胡適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對當時思想的解放上誠起了相當進步的啓蒙作用，然並沒有觸着各派哲學思想的本質；而且在『上冊』出版後，便不能繼續下去，無異宣告其實驗主義方法論的失敗。梁啟超先生在實驗主義方法論的素養上，還似乎比胡適先生高明些；他對『先秦思想』研究的著作，在當時也同樣起了相當的進步作用，但也同樣沒有觸着『諸子』思想的本質。李石岑先生在實驗主義的階段，對中國哲學思想並沒有究出一個系統來，在其逝世前的數年間，便開始拋棄實驗主義，接受史的唯物論去研究中國哲學史，這是一個值得欽佩的進步。渡邊秀方的『中國倫理學史』等書，却不但把中國社會思想各流派的本來面目隱蔽着，而又被其庸俗化了。雖然，在半殖民地文化支配下的中國學術界，宗主國學者的意見，却容易獲得人們重視，所以像渡邊那樣無價值的著作，也公然在中國流行。一九二七年以後，才有人應用史的唯物論的方法來從事這一課題的研究；然其中如嵇文甫、楊東蓀，在其主觀上就只在想利用

史的唯物論，客觀上當然只能完成其反科學的任務。楊東蓀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講話』，第一由於其對中國社會史概念的故意模糊，自始便迴避從社會經濟構成及其變動的基礎上，以及社會階級構成階級關係和其力量對比變化的基礎上，去論究各派思想發生的根源和其本質；第二他應用的科學方法，自始就是自覺的經濟主義。嵇文甫對宋元明思想的研究，基本上是和楊東蓀一樣的。至於陶希聖、李季、葉青之流，更不只是偽冒史的唯物論的招牌，來販運反史的唯物論的商品，而且是別有『包藏禍心』的企圖，特別是葉青、陶希聖的卑鄙的反革命企圖。所以陶希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不只表現概念上的極端模糊，且自始只從政治原因上去解說其所謂『政治思想』，並沒有半點『唯物辯證法』的氣味，只是半實驗主義化身的露骨觀念論。而他正企圖以此來麻痺青年的。李季的『胡適中國哲學大綱批判』，基本上並不是什麼學術的研究，而是應用假馬克思觀點來反對馬克思主義，來破壞革命。由假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的王宜昌的一些歷史論文，把中國民族文化曲說為毫無生命力的殭屍，謂沒有外力的撞擊就不能有絲毫的進步性。這也不是什麼理論上的問題，而是他們在響應日本法西斯軍閥的對華侵略。葉青的『胡適批判』等書，是應用假馬克思主義再加上假三民主義觀點寫成的，更不是什麼學術研究，而是其向日本法西斯和大資產階級特務機關的陳情書；假馬克思主義，是他尋找主子的本錢，假三民主義觀點是他乞取主子錄用的存書。所以他故意抹煞『五四』時期自由主義文化思想運動的進步性，故意曲解中國古代哲學，抬高保守的落後的封建思想，都不過是他迎合其特務機關主子的觀點之一種方式。

我在本書的基本出發點，是：

哲學思想，雖能作用於社會經濟和政治，基本上却是被決定於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形態，並與之相互適應，隨着其發展變動而發展變動的。如作為封建統治階級哲學的儒學、道學和佛學，在其各自的本質上，雖通過全封建時代都是相同的；然而隨着中國封建制度的長期過程，以及其在過程中之不斷的部分的質變，也同樣在起伏着，變化着。同時，由於階級內部各階層間以至階層內部矛盾的存在，所以同是封建地主的哲學，而有儒學、道學和佛學的分別，在儒學、道學、佛學各自的內部又有其流派的歧異；又由於各階層相互關係的變動，有時表現儒、道、佛三者的相互對立，有時表現三者的統一，有時表現儒道思想的統一與佛學思想的對立。這不過是一方面的例子，即是表現歷史自身的生動性，不是機械般可以把握着的。

(四)

本書原先決定由不二書店出版，旋承孫寒冰、馮和法兩先生雅意，改由黎明書局出版。一本書的出版，完全由我自己覆校過。但在時間的倉卒中，或仍不免有魯魚亥豕之訛。

當我寫本書的時候，承許多學術先進朋友給了我不少指示和幫助，尤其是吳檢齋先生給我的幫助更多。又我的弟弟持平曾從自然科學方面說明光、音、電等的運動法則（完全符合唯物辯證法的法則——雖然持平並沒有學過唯物辯證法），貢獻我作為哲學原理的參考。又本書原稿大部分，承袁炎烈、李邦彥兩先生為我抄寫過。我應該向他們表示謝意。

中國政治思想史

增訂版

初版序

第一編 導言

壹 研究的方法

貳 中國政治思想之史的流變

第二編 商朝奴隸制度時代的

巫教神學和『八卦』哲學

壹 巫教神學的兩重世界觀

八

四

一

一

八

第三編

貳

一	『人』的階級和『神』的階級……………	八
二	『神間』的『天』與『帝』和人間的『帝』與『王』……………	一二
三	巫教僧侶的職份和巫教……………	一四
貳	由奴隸制到封建制變革時代的政治學說——周易……………	一六
一	卦詞、爻詞、易卦、易傳之出世時代……………	一六
二	由神學的宇宙觀到辯證的宇宙觀……………	一八
三	由唯物論再降到觀念論……………	二〇

初期封建政治思想的演化……………

二三

壹

作為

政治學說的『洪範』……………

二三

和王權之統一的思想……………

二六

而來的政治思想的演化……………

三〇

思想的動搖……………

三〇